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

——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

庞晓鹏¹ 龙文进¹ 董晓媛² 曾俊霞³

摘要：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获取大样本数据，通过对样本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九千多名学生的调查，分析了西部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现象，探讨了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学生家长在租房陪读上的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家长租房陪读的小学生占西部农村小学生的 1/4；低经济水平组家庭家长租房陪读的概率更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为了让子女获得相同水平的教育，低经济水平家庭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租房陪读，这是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低经济水平家庭家长租房陪读概率高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寄宿可得性、父母就业、房租和生活成本、择校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租房陪读 农村教育 教育公平 学校布局调整 寄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 2000 年开始，各地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小学数量从 2000 年的 44 万所下降到 2012 年的 15.5 万所，减少了约 65%^①，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数量下降幅度更大。2012 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暂停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最直接的影响是更多的学生上学路程变远，学生往返学校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在路上可能会遇到更多风险，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Zhao and Parolin, 2012）。可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明显加剧了农村内部的教育不公平，边远地区的学生家庭被迫承担了更多政策成本。

*本文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寄宿或租房？——农村小学租房陪读生成绩、心理比较研究”（批准号：2015M570897）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在外居住抉择与家乡住房投资行为研究”（批准号：71373271）的资助。笔者于 2015 年 6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性别、公共政策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研究”会议上报告了此文，感谢与会者的评论和建议，同时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编），2013：《中国统计年鉴 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为了减少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于 2004 年开始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又于 2011 年秋季学期，在集中连片的农村（不含县城）特殊困难地区，启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到 2012 年，营养改善计划在 680 个贫困县的中小学全面开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大部分研究表明，政府加大对农村寄宿生补助、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后，农村寄宿生的营养水平明显提高（李文等，2011；齐良书、赵俊超，2012；孟丽苹等，2013）。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寄宿并不能提高学生的成绩（Chen et al., 2013），寄宿学生在营养、健康与成绩上甚至比非寄宿学生还差（Wang et al., 2016）。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还有待改善（Yue et al., 2014），寄宿制学校的住宿条件、生活设施等也有待改进（Luo et al., 2009）。可以说，寄宿制学校建设不仅解决了布局调整后农村学生上学距离远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学生营养不良问题。然而，寄宿制学校并不是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学生的唯一选择，许多家长选择了在校外租房陪读。

目前有数据支撑的、研究农村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的文献较少^①，但仅有的少量文献都表明：农村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例如，2011 年秋季学期，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镇中学陪读生比例达 46%（王章泽、吴光华，2012）；王莉、张彩琴（2014）调查的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219 名中小學生中有 117 名是陪读学生，占 53%；谢芳等（2014）调查了甘肃高中、初中和小学共计 6657 名学生，发现高中陪读生比例为 25.8%，初中陪读生比例为 21.1%，小学陪读生比例为 42.2%；王雪、张春兰（2016）调查了山西某县级市的 1 所城郊小学，发现在 218 名从其他学校转学到该校的学生中，陪读生的比例为 36%。

然而，仅有的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文献，其数据缺乏代表性，多是使用个别学校或者某几所学校的数据；这些文献所用的变量大多只是局限在学生或学校层面，缺少相关的家庭背景和政策信息；这些文献大多只做了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对影响家长租房陪读的因素缺少深入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初中和高中阶段，而忽视了小学阶段；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县城及以上城市，乡镇一级被忽视。此外，目前还没有文献分析农村家庭在选择租房陪读、寄宿或住家走读的差异。

与寄宿相比，租房陪读的经济成本更高。那么，选择租房陪读的家庭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庭吗？为什么许多家长选择租房陪读而不是让孩子在学校寄宿呢？

本文将首次使用随机抽样大样本数据描述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的现状，并结合学生寄宿和住家走读情况，探讨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学生家长在租房陪读上的差异及其可能的原因。本文能够拓宽对农村陪读学生这一不同于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流动儿童的群体的认识，为解决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暂停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①许多文献以陪读而不是租房陪读为研究内容。由于租房陪读是陪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把陪读视同于租房陪读。从逻辑上看，“租房陪读”指的是“家长”，而学生是“被陪读”。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分别称“租房陪读家长”为“陪读家长”，“被陪读学生”为“陪读（学）生”，“住家走读生”为“走读（学）生”。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问题的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理论并提出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说明；第四部分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分析家庭经济条件对学生上学居住方式选择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租房陪读既是一种教育决策，也是一种人口迁移方式。因此，可以从政府的教育供给、家庭教育需求、家庭迁移以及教育城镇化等理论视角研究租房陪读现象。

（一）政府的农村教育供给

政府的农村教育供给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和教师的人事安排实现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各级政府农村教育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划分（赵力涛，2009）。对农村学生家庭而言，政府的教育供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学校的可及性，主要体现为学校数量、学校与家庭住所的距离以及入学资格。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后，学校数量大量减少，学校与家庭住所的距离大幅增加，农村学校的可及性下降。从入学资格上看，政府已经放开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转学或者异地就学的限制，农村学生家庭拥有更多选择学校的机会和权利。二是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设施水平。当基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后，家长就会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由于各学校在教学质量和设施水平上的差异，择校现象就会产生。城市高价格学区房就是“择校”最直接的体现（冯皓、陆铭，2010）。在农村，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许多家长把学生送到城里就读。同时，教学点、村小、乡镇完小等不同级别的农村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和设施水平上也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催生了农村家长的“择校”行为。

（二）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

家庭教育决策取决于教育的收益和成本。教育收益取决于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父母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预期越高，其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大。所以，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未来教育收益在当下的体现。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就会越重视教育，越可能花高成本为孩子租房陪读。此外，孩子的成绩越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预期回报也会越高（姚扬，2013）。

教育成本既包括直接的学费、补课费、生活费等，也包括由于照料孩子而付出的机会成本。例如，寄宿生由于住在学校，不能为父母分担家务劳动，父母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会增加，获得收入的时间就会减少。由于租房陪读家庭的租房地一般远离老家村庄，因此陪读家长无法在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导致其家庭农业收入减少。并且，陪读家长很难在租房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几乎没有非农收入。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所能承担的教育成本不同。一般来说，低收入家庭对成本更为敏感（Alderman and Paterno，2001）。因此，在分析教育成本对教育决策的影响时要特别考虑家庭收入状况。

此外，农村文化因素，特别是“重男轻女”观念、从众心理等，也会影响家庭的教育决策。

（三）农村家庭迁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主要受到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影响(李强, 2003), 而农民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口结构、家庭土地拥有量等都会影响到农民迁移决策(Zhao, 1999)。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经历了单独外出、夫妻双方共同外出、携带子女和老人外出三个阶段, 流动人口家庭由“核心化”向“推展化”转变(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5), 由非家庭式流动和半家庭式流动转向家庭式流动(杨菊华、陈传波, 2013)。子女教育是影响家庭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学校数量减少, 这增加了家庭外出迁移的可能性(Liu and Xing, 2016), 租房陪读正是教育移民的体现。但是, 租房陪读是一种暂时性的迁移, 在孩子完成学业后, 家庭可能会终止这种迁移。此外, 父母外出情况、子女数量和性别等, 也会影响家庭迁移决策。

（四）农村教育城镇化

城镇化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 城镇化促使农村学生大量外流, 在市场主导的城镇化推动下, 学校布局调整和规划主要依据人口流动和学校的发展(荣利颖、宋婷娜, 2016)。另一方面, 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催生了更多的教育移民(秦元刚, 2014), 并且由于教育移民所花费的成本在各类移民中最低(李含琳等, 2006), 农村教育城镇化往往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这种行政主导下的城镇化往往使得学校布局调整步伐过快, 忽略了农村教育的实际需求(荣利颖、宋婷娜, 2016)。

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要求和推动力。在农村教育城镇化进程中, 农民可以通过购房入户来解决孩子教育问题(刘雅晶, 2014), 也可以通过陪读、寄宿、走读、寄养、寄管、随读等形式让孩子到城镇就学(魏登尖, 2013)。但是, 教育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农村撤点并校(胡俊生, 2014), 教育城镇化的范围和速度需要适应各地实际情况。

（五）分析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农村学生家长租房陪读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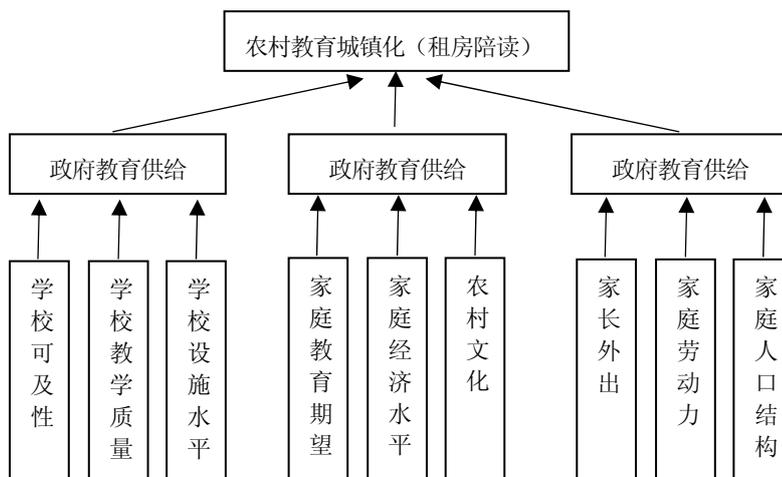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家长租房陪读研究分析框架

本文将租房陪读视为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种形式，从政府教育供给、农村家庭教育需求和农村家庭迁移三个角度来研究租房陪读。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方法

由于学生的上学居住方式包括住家走读、寄宿和租房陪读三种，因此，本文将采用多元选择 Logit 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学生的上学居住方式，解释变量是学生家庭经济水平。其它控制变量包括学校可及性、学校教学质量、学校生活设施、家庭教育期望、家长外出情况、家庭人口结构及特征等。考虑到抽样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的，在做多元选择 Logit 回归分析时，本文计算以学校为单位的系数的聚类标准误差（cluster standard error）。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对陕西省榆林市 11 个县（区）^①133 所农村乡镇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 9179 名学生所做的调查。2013 年 5 月，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共同组织实施了这项调查。调查首先收集了各县（区）所有小学的名单和各年级学生总数，然后在县（区）内每个乡镇选取同时有四年级和五年级并且这两个年级学生总数超过 50 人的学校。如果乡镇内符合条件的学校超过一个，则在符合条件的学校中随机选取一所。在选取的学校中，四年级和五年级各随机选取一个班，对该班的所有学生进行调查。此外，调查人员还对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文中的定性访谈资料来自 2014 年 6 月份在榆林市榆阳区和佳县做的深度访谈。

（三）变量设定与描述

1.被解释变量：上学居住方式。在调查问卷中，问题“这个学期你大部分时间住在哪里？”用来反映学生的上学居住方式，学生上学居住方式包括住家走读、在学校住宿、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和其他。“其他”上学居住方式主要是指在亲戚家居住，只占总数的 1.17%。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没有把“其他”上学居住方式纳入分析。本文中學生上学居住方式分布见表 1。

	总体	按性别分类	
		男生	女生
住家走读	32.75	32.29	33.29
寄宿	42.14	43.49	40.58
租房陪读	25.11	24.22	26.13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①榆林市共有 12 个县（区）。吴堡县由于人口太少，没有被纳入调查框。

从表 1 可以看出, 寄宿生占学生总数的 42.14%, 在各上学居住方式中占比最高, 走读生占 32.75%, 陪读生的比例高达 25.11%。这说明, 租房陪读已经非常普遍, 成为调查中 1/4 学生家庭的选择。

2.解释变量: 家庭经济水平。由于没有直接衡量学生家庭经济水平的变量, 参照 Chen et al. (2013) 和 Yue et al. (2014) 的研究, 本文利用家庭住房市场价值^①与家庭大件物品数量来测量学生家庭的经济水平。

家庭住房市场价值主要指学生老家房屋的市场价值。房屋作为农民重要的资产, 其市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经济水平。本文把房屋价值不足 5000 元的家庭列为“低经济水平组”, 把房屋价值在 5000~1 万元的列为“中低经济水平组”, 把房屋价值在 1 万~5 万元的列为“中高经济水平组”, 把房屋价值在 5 万元以上的列为“高经济水平组”。不同上学居住方式学生家庭住房的市场价值和经济水平见表 2。

房屋市场价值	家庭经济水平	住家走读	寄宿	租房陪读	平均
5000 元以下	低	33.48	30.96	50.49	36.70
5000~1 万元	中低	19.03	25.03	21.06	22.07
1 万~5 万元	中高	20.14	21.97	16.50	19.99
5 万元以上	高	27.35	22.05	11.95	21.24
合计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家庭大件物品指 16 项物品, 包括小汽车、照相机、货车、洗衣机、摩托车或电动车、空调、拖拉机、热水器、大型农机具、煤气或液化气炉具、电脑、抽油烟机、因特网、电冰箱或冰柜、电视机、抽水马桶。按照大件物品数量, 本文把学生家庭经济水平分成四类, 具体见表 3。

家庭大件物品数量	家庭经济水平	住家走读	寄宿	租房陪读	平均
0~2	低	10.07	12.61	16.62	12.79
3~4	中低	28.51	33.42	35.95	32.45
5~6	中高	27.43	28.92	27.03	27.96
7~16	高	33.99	25.05	20.40	26.79
合计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①笔者还询问了学生老家的房屋建筑类型。榆林地区最常见的住房是窑洞和砖混结构房屋。但是, 本文的实地调查发现, 不同的窑洞价格相差非常大, 所以, 这里房屋建筑类型不是一个好的家庭经济水平的替代变量。

对比表 2 和表 3，虽然两者都显示陪读学生家庭的经济水平要比寄宿学生和走读学生低，但是两种方法衡量的家庭经济水平分布差异较大。为了减少两种不同方法在测量上的误差，本文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的家庭经济水平分布表，具体见表 4。

表 4 学生家庭经济水平：综合家庭住房市场价值和大件物品数量

家庭住房市场价值	家庭大件物品数量			
	0~2	3~4	5~6	7~16
5000 元以下	低	低	中低	中低
5000~1 万元	低	中低	中高	中高
1 万~5 万元	中低	中高	中高	高
5 万元以上	中低	中高	高	高

按照表 4，本文得到不同上学居住方式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具体见表 5。低、中低、中高和高经济水平的家庭分别占 25.54%、24.02%、27.02% 和 23.42%。在走读学生中，高经济水平家庭比例最高；在寄宿学生中，中高经济水平家庭比例最高；在陪读学生中，低经济水平家庭比例最高。

表 5 学生家庭经济水平：综合分类 单位：%

家庭经济水平	住家走读	寄宿	租房陪读	平均
低	20.29	23.64	35.59	25.54
中低	23.82	22.12	27.50	24.02
中高	25.06	30.77	23.21	27.02
高	30.83	23.47	13.70	23.42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把这三类方法所测量的家庭经济水平放入模型中。

3.控制变量。为了衡量学校的可及性，本文选择了 3 个变量：学生从家到学校的时间、乘坐的交通工具和学生转学类型。这三个变量直接受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影响。学校教学质量用各学校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的平均水平来衡量，按此数据把学校分成好、中、差三类。学校教学质量可以用来分析家长的择校行为。

本文通过单人床位、冬天取暖、厕所路灯、食堂、开水和生活老师 6 个变量来衡量学校寄宿条件，符合每一项条件的学校得 1 分，然后将 6 项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学校寄宿条件总体得分，用来衡量学校寄宿条件的好坏。本文还考虑了学校的规模和位置，以便在模型中更多地控制学校特征的影响。

学生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所在年级。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学生兄弟姐妹数量、家庭留守劳动力数量。父母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包括父母亲都不外出、父亲单独外

出、母亲单独外出和父母都外出 4 种情况。学生的性别、兄弟姐妹数量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测量农村文化对上学居住方式的影响。

本文虽然没有变量直接测量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和态度，但是在模型中控制了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而通常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对教育的认识和态度密切相关。此外，孩子的成绩通常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强烈影响，因而，本文把孩子的标准化数学成绩也放入模型。

为了控制地区不可观测因素，本文按照 2013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把各县（区）划分为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三类。

各控制变量的特征描述见表 6。

表 6 控制变量描述表

控制变量类别	具体变量	住家 走读	寄宿	租房 陪读	平均	有效 观测 值
	从家到学校时间（分钟）	12.74	39.89	66.91	37.31	8858
	从家到学校的交通工具					9055
	步行（%）	75.64	26.96	25.20	42.45	
	自行车、摩托车（%）	12.21	31.96	22.34	23.08	
	汽车等（%）	12.15	41.08	52.46	34.47	
学校可及性	转学类型					9071
	没有转学（%）	64.86	33.41	45.22	46.68	
	村里教学点（%）	6.80	22.95	15.94	15.90	
	村里完小（%）	4.91	11.70	8.502	8.68	
	乡镇小学（%）	10.77	17.84	14.62	14.72	
	其它学校（%）	12.66	14.1	15.72	14.03	
	性别					9071
	女生（%）	47.32	44.86	48.46	46.57	
	男生（%）	52.68	55.14	51.54	53.43	
学生个体特征	年龄（岁）	11.23	11.54	11.34	11.39	9042
	年级					9071
	五年级（%）	46.79	55.22	49.47	51.01	
	四年级（%）	53.21	44.78	50.53	48.99	
家庭教育期望	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	0.02	-0.08	0.10	0.00	9071
家庭人口结构	弟弟妹妹数量（人数）	1.19	1.32	1.24	1.26	9064
	家庭留守劳动力数（人数）	0.82	1.08	0.67	0.89	8536
父母个人特征	父亲年龄（岁）	38.24	39.40	38.43	38.78	9010
	母亲年龄（岁）	36.12	36.78	36.08	36.39	8972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

	父亲小学文化或以下 (%)	65.54	57.33	61.22	61.00	9035
	父亲初中文化或以上 (%)	34.46	42.67	38.78	39.00	
	母亲小学文化或以下 (%)	60.55	58.02	55.89	58.31	9008
	母亲初中文化或以上 (%)	39.45	41.98	44.11	41.69	
父母外出	父母亲都不外出 (%)	59.27	61.7	50.00	57.96	9071
	父亲单独外出 (%)	30.93	23.29	41.18	30.28	
	母亲单独外出 (%)	3.47	4.06	1.84	3.31	
	父母都不外出 (%)	6.33	10.96	6.98	8.44	
学校生活设施	学校寄宿条件得分	4.41	5.22	3.94	4.64	9071
学校特征	学校规模 (人数)	514.8	413.14	540.96	478.53	9071
	学校距离县城距离 (公里)	34.29	41.9	34.26	37.49	9071
学校教学质量	学校教学质量 (数学成绩)					9071
	差 (%)	30.87	42.2	21.25	33.23	
	一般 (%)	33.73	28.68	38.72	32.85	
	好 (%)	35.41	29.12	40.04	33.92	
地区因素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9071
	发达地区 (%)	23.83	12.61	28.58	20.30	
	一般地区 (%)	34.40	50.65	29.94	40.13	
	落后地区 (%)	41.77	36.73	41.48	39.58	

四、模型结果描述和分析

(一) 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上学居住方式的影响

本文把寄宿生作为参照组,根据设定的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系数及其标准误差,具体见表 7。除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变量不同以外,方程一、方程二、方程三所使用的其他控制变量完全相同。方程一用家庭住房市场价值来测量家庭经济水平,方程二用家庭大件物品数量来测量家庭经济水平,方程三综合了家庭住房市场价值和家庭大件物品数量来测量家庭经济水平。从解释变量家庭经济水平对租房陪读的影响上看,虽然 3 个方程中的系数不一致,但是,解释变量在 3 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基本一致。这种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的一致性也体现在 3 个方程中其它变量上。因此,本文用三种不同的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由于方程三综合使用了家庭住房市场价值和家庭大件物品数量来测量家庭经济水平,因此,方程三具有更强的稳健性。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以方程三估计结果为基础,计算出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对三种上学居住方式的边际效应,结果见表 8。

表 7 小学生上学居住方式影响因素：多元选择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一：房屋市场价值		方程二：家庭大件物品		方程三：综合	
	住家走读	租房陪读	住家走读	租房陪读	住家走读	租房陪读
家庭经济水平（参照组：高）						
低	-0.2087 (0.1274)	1.0060*** (0.1203)	-0.2876* (0.1619)	0.4787*** (0.1722)	-0.4119*** (0.1458)	0.8682*** (0.1619)
中低	-0.3857*** (0.1310)	0.4997*** (0.1401)	-0.3517*** (0.1332)	0.3683*** (0.1280)	-0.1585 (0.1439)	0.7128*** (0.1502)
中高	-0.2168* (0.1307)	0.4512*** (0.1395)	-0.2106* (0.1204)	0.2395** (0.1212)	-0.3516*** (0.1212)	0.3543*** (0.134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8116		7829		7798	
对数虚拟似然值	-5286		-5161		-5095	
McFadden's R ²	0.3935		0.3855		0.3909	
预测准确率	0.7251		0.7261		0.7261	

注：①括号内数字为以学校为单位的聚类标准误差；②*、**、***分别代表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③因篇幅限制，本表未汇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表 8 各变量边际效应：以方程三为基础

	住家走读生	寄宿生	租房陪读生
家庭经济水平（参照组：高）			
低	-0.0823***	-0.0419**	0.1242***
中低	-0.0465***	-0.0431**	0.0897***
中高	-0.0521***	0.0000	0.0521***
学校教学质量（参照组：差）			
中	-0.0172	-0.0389	0.0561**
好	-0.0512**	0.0034	0.0477*
学校寄宿条件	-0.0299***	0.0673***	-0.0373***
从家到学校时间	-0.0087***	0.0044***	0.0043***
交通工具（参照组：步行）			
自行车摩托车	-0.2717***	0.2134***	0.0583***
汽车等	-0.3698***	0.2469***	0.1229***
转学类型（参照组：没有转学）			
村里教学点	-0.1176***	0.1460***	-0.0283*
村里完小	-0.0871***	0.1196***	-0.0324*
乡镇小学	-0.0597***	0.1030***	-0.0433***
其它学校	-0.0455***	0.0729***	-0.0274**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

男性	0.0040	0.0037	-0.0077
年龄	-0.0252 ^{***}	0.0488 ^{***}	-0.0236 ^{***}
四年级	-0.0051	-0.0185	0.0235 ^{**}
标准化数学成绩	-0.0012	0.0029	-0.0017
弟弟妹妹数量	0.0086	-0.0438 ^{***}	0.0352 ^{***}
家庭留守劳动力数量	-0.0035	0.0226 ^{***}	-0.0192 ^{***}
父亲年龄	-0.0012	0.0045 ^{***}	-0.0033 ^{**}
母亲年龄	0.0013	-0.0020	0.0008
父亲初中文化及以上	0.0159 [*]	-0.0309 ^{***}	0.0150 [*]
母亲初中文化及以上	0.0147 [*]	-0.0013	-0.0134
父母外出情况（参照组：都不外出）			
父亲单独外出	-0.0166 [*]	-0.0788 ^{***}	0.0955 ^{***}
母亲单独外出	-0.0184	0.0432	-0.0248
父母亲都外出	-0.0637 ^{***}	0.0736 ^{***}	-0.0099
学校距县城距离	-0.0017 ^{***}	0.0018 ^{***}	-0.0001
学校规模	0.0000	-0.0002 ^{***}	0.0001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照组：经济一般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	0.1529 ^{***}	-0.2871 ^{***}	0.1342 ^{***}
经济落后地区	0.0150	-0.1086 ^{***}	0.0936 ^{***}
观测值	7798	7798	7798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 8 可以看到，低、中低和中高经济水平家庭组，租房陪读的概率分别要比高经济水平家庭组高 0.1245、0.0897 和 0.0521。图 2 更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在租房陪读预测概率上的差异。

总体来说，在经济水平相同的家庭中，选择让孩子寄宿的概率最高，租房陪读的概率最低，住家走读的概率居中。特别地，在选择租房陪读的概率上，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的差异非常明显。低经济水平组家庭选择租房陪读的概率最高，为 0.2957；其次是中低和中高经济水平组家庭，分别为 0.2630 和 0.2254；高经济水平组家庭选择租房陪读的概率最低，只有 0.1733。显然，低经济水平家庭为孩子租房陪读的概率最高，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租房陪读的概率快速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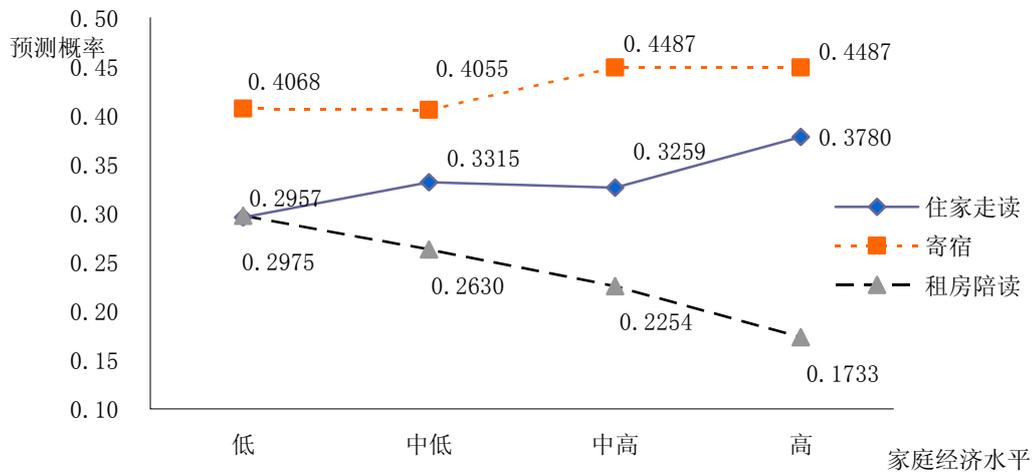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经济水平家庭上学居住方式的预测概率

(二) 低经济水平家庭租房陪读概率高的原因分析

1.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由于边远村庄的学校更容易被撤并，边远地区家庭受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影响会更大。而边远地区家庭更可能是相对贫穷的家庭，所以，低经济水平家庭受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冲击更大。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低经济水平家庭选择让孩子住家走读概率低，但不能解释低经济水平家庭选择租房陪读而不是寄宿。另外，由于调查的时间与布局调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一致，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对上学居住方式选择的影响在回归中可能无法全部体现。

2.寄宿可得性。家长选择租房陪读而不是让孩子寄宿的原因之一是学校没有寄宿条件，不得不租房陪读。本文的实地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首先，在全部 133 所样本学校中，寄宿生占 42%，租房陪读生占 25%；在有寄宿条件的 117 所样本学校中，寄宿生占 47%，租房陪读生占 21%。有寄宿条件的学校寄宿生的比例高，而租房陪读生的比例低。这说明，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会影响学生的上学居住方式选择。

其次，本文用多元 Logit 模型预测不同经济水平家庭在全部学校样本模型和寄宿制学校样本模型中选择不同上学居住方式的预测概率^①。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水平不同的家长在寄宿制学校样本中选择寄宿的预测概率，都高于其在全部学校样本中选择寄宿的预测概率，并且家庭经济水平不同的家长在寄宿制学校样本中选择租房陪读的预测概率，都低于其在全部学校样本中选择租房陪读的预测概率。这也说明，寄宿制学校能够增加学生寄宿、降低家长租房陪读的可能性。

^①本文没有报告寄宿学校样本模型结果，寄宿学校样本模型形式和变量设定与表 7 方程三（即全部学校样本模型）的方法和变量设定完全一致，读者如感兴趣，可向笔者索要。

此外，即便是在寄宿制学校样本中，高经济水平家庭选择租房陪读的预测概率仍然远远低于低经济水平家庭，这与本文前面有关低经济水平家庭选择租房陪读概率高的结论一致。

寄宿制学校确实对学生上学居住方式选择有影响，但影响有限。一方面，家长在把孩子送到非寄宿制学校时是清楚地知道孩子在非寄宿制学校是无法寄宿的。另一方面，一些寄宿制学校的寄宿条件是可以变通的。例如，学校在必要时可以把一些空余的教室或者办公室改造成学生宿舍。此外，由于寄宿生的增加可以给学校增加补贴，所以，有寄宿条件的学校对寄宿生一般没有准入限制。本文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所有陪读学生中，有72%的学生所在的学校有寄宿条件，另外28%的学生所在的学校没有寄宿条件。这也说明，寄宿条件虽然限制了学生的居住选择，但作用有限。

3.父母就业因素。学生上学居住方式选择与父母就业是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父母的就业情况会影响到子女的上学居住方式选择。本文的实地访谈发现，在外务工的父母，特别是在当地乡镇务工的父母，很有可能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样既合理安排了家庭经济活动，又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从这一角度看，租房陪读实际上是家长外出务工的“副产品”。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低经济水平家庭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的比例为47.49%，明显高于高经济水平家庭的这一比例（33.61%）。可见，低经济水平家庭更可能选择租房陪读。此外，即便同是外出务工，经济水平高的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地可能离家更远，低经济水平家庭父母外出务工可能离家更近（Zhang and Zhao, 2013），而离家更近的家长租房陪读的可能性也更高。

本文的实地访谈还发现，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父母会更加重视教育，因为他们在务工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教育不足带来的后果，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投入力度也更大。

另一方面，子女的上学居住方式选择也会影响父母的就业。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陪读学生中父母共同监护型所占比例最高，为55.18%；其次是母亲单独监护型，占32.34%；父亲单独监护型所占比例最低，只有2.17%；其他10.31%为无父母监护型（主要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总体来看，87.52%的陪读生有母亲监护，57.35%的陪读生有父亲监护。母亲作监护人的比例比父亲作监护人的比例高30多个百分点，因此，租房陪读对母亲就业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实地访谈也发现，多数母亲无法在租房所在地就业。由于租房所在地离老家较远，孩子上学期间监护人无法回老家从事劳动，因此，对租房陪读家庭而言，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庭劳动收入肯定会减少。

相对于其他经济水平水平的家庭，低经济水平家庭孩子无父母监护的比例最低。这说明，低经济水平家庭父母需要承担起更多照料孩子的责任，其获取劳动报酬的可能性下降，家庭经济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4.房租和生活成本。孩子教育支出既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也会影响到家庭经济情况。对于租房陪读家庭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房租和生活成本的增加。调查没有直接问陪读家长房租是多少，但在校长问卷中询问了学校周边的平均房租水平。本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学校周边房租的中位数为每月120元。如果按9个月计算一年房租，那么，租房陪读家庭一年要多支出1080元的房租。而2013年中国贫困线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房租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

负担，甚至很有可能把一些在贫困线之上的家庭拖入贫困线以下^①。

本文把各学校周边房屋的平均月租金当作各学校陪读学生家庭的平均月租金支出，然后据此计算出所有学校中不同经济水平家庭租房陪读所承担的平均租房成本。研究发现，在所有租房陪读家庭中，高经济水平家庭所负担的房租最高，这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相适应；低经济水平家庭平均月租金的中位数和平均值都高于中低经济水平和中高经济水平家庭。这说明，虽然低经济水平家庭负担的平均月租金低于高经济水平家庭，但高于中低经济水平和中高经济水平家庭，这与他们家庭的支付能力是不匹配的。

除房租外，在乡镇的生活费用也明显高于农村，这对低经济水平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对于租房陪读家庭，他们必须在支付租房陪读的成本和其它家庭消费之间进行取舍，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弃修盖房子、放弃购买大件物品等。

5.择校因素。一般来说，教学质量好的学校相对集中在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当地的家庭也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说，高经济水平家庭能够就近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而来自偏远地区的低经济水平家庭为了获得相对高质量的教育就不得不租房陪读。

6.其他因素。低经济水平家庭监护人陪读的机会成本低，监护人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陪读，这也是低经济水平家庭租房陪读概率高的原因。在本文的实地访谈中，有个别母亲和祖父母表示，他们反正在家也是闲着，挣不了什么钱，还不如租房陪孩子，让孩子把书念好。此外，部分低经济水平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可能更大，更加希望孩子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暂停的背景下，西部农村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中有25%是由家长租房陪读，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②。相对于其他经济水平水平的家庭，低经济水平家庭租房陪读的概率最高^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客观上看，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许多边远村庄的学校被撤并，加上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落后，家长不愿意把孩子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因此选择租房陪读；主观上看，这是低经济水平家庭为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家庭策略，为此他们也承担了更高的成本，包括租房等直接成本和无法就业获得收入等机会成本。

本文的实地访谈发现，农村经济条件最好的家庭多数会选择举家外迁到县城、地级市或者省城；而选择在乡镇小学就读的，很多都是“走不出去”的家庭；留在村小学就读的孩子，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比留在乡镇就读的更差。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农村教育出现了两种新特征：条件最好的

^①有研究表明，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要比农村高收入群体高，因此低收入群体中的教育支出对其陷入贫困的贡献更大（Gustafsson and Shi, 2004）。

^②本文没有其他年级学生的数据，但是，由于低年级学生更需要家庭照料，所以，低年级陪读生的比例相应地会更高。

^③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强调家庭经济水平与租房陪读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展现不同经济水平家庭学生在租房陪读上的差异。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这两者间的强相关关系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家庭会为孩子选择县城及以上的学校，这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留在村庄或乡镇的家庭之间的教育差距；而留在乡镇的部分家庭，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成本高的租房陪读，这也加剧了留在乡镇的家庭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从根本上看，家长选择租房陪读是为了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低经济水平家庭为了获得优质教育不得不选择租房陪读，而租房陪读反过来又使得低经济水平家庭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低经济水平家庭为了获得与中高经济水平家庭同样质量的教育，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这加剧了教育不公平。这种双重不公平严重违背了“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后 2015 发展议程”的精神和宗旨，也与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的“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的目标相违背。

虽然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被撤的学校会恢复或者以后不再做布局调整。从农村人口结构变动、城镇化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依然面临着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转型的问题。在现有的农村学校布局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学生租房陪读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普遍。租房陪读不仅仅是学生家庭的一种上学居住方式选择，它还涉及家庭成员的劳动与分工、小城镇规划与发展、扶贫开发等问题。随着租房陪读比例的增加，租房陪读对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低经济水平家庭对学校布局调整这类教育政策更为敏感，受影响也更大。因此，政府在制定农村教育政策时应从更公平的角度出发，让低经济水平家庭更多地受益，以促进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 1.冯皓、陆铭，2010：《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世界经济》第12期。
- 2.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3.胡俊生，2014：《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李含琳、魏奋子、王悦，2006：《中国西部干旱贫困县教育移民调查报告——兼论教育移民的政策意义和可行性》，《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5.李强，200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6.李文、汪三贵、王姮，2011：《贫困地区寄宿制学生营养餐项目效果评估》，《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 7.刘雅晶，2014：《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教育移民问题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8.孟丽苹、张倩、胡小琪、潘慧、刘爱玲、郝丽楠、赵静、马冠生，2013：《陕西省两县农村寄宿制学生营养干预的效果评价》，《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6期。
- 9.齐良书、赵俊超，2012：《营养干预与贫困地区寄宿生人力资本发展——基于对照实验项目的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
- 10.秦元刚，2014：《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与县域内教育移民的关系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王莉、张彩琴，2014：《农村中小学生家长随迁型陪读现状及原因分析——以张掖市甘州区农村陪读家长为例》，《河西学院学报》第1期。

- 12.王雪、张春兰, 2016:《农村家长何以陪读——基于山西省G市陪读家长的考察》,《农村经济与科技》第9期。
- 13.王章泽、吴光华, 2012:《农村中学生校外租房问题分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第17期。
- 14.魏登尖, 2013:《农村教育城镇化进程中中学生监管问题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5.谢芳、王金兰、王建民、刘茂昌、丁斌、香成福, 2014:《从“陪读”现象看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以甘肃省为例》,《现代中小学教育》第8期。
- 16.杨菊华、陈传波, 2013:《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 17.姚扬, 2013:《高中陪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基于浙江省台州市的实证分析》,清华大学本科学位论文。
- 18.赵力涛, 2009:《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体制改革:变化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2:《2011农村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改善评估报告》, <http://www.cdrf.org.cn/uploads/soft/PDF/20120625/112baogao.pdf>。
- 20.Alderman, H., and E. M. Paterno, 2001, “School Quality, School Cost, and the Public/Private School Choice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Pakista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6(2): 304-326.
- 21.Chen, X., H. Yi, L. Zhang, D. Mo, J. Chu, and S. Rozelle, 2013, “Do Poor Students Benefit from China's Merger Program? Transfer Path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4(1): 15-35.
- 22.Gustafsson, B., and S. Li, 2004, “Expenditure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5(3): 292-301.
- 23.Liu, J., and C. Xing, 2016, “Migrate for Education: An Unintended Effect of School District Combination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0: 192-206.
- 24.Luo, R., Y. S. Li, Zhang, C. Liu, S. Rozelle, and B. Sharbono, 2009, “Malnutrition in China's Rural Boarding Schools: The Case of Primary Schools in Shaanxi Provi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9(4): 481-501.
- 25.Yue, A., Y. Shi, F. Chang, C. Yang, H. Wang, H. Yi, R. Luo, C. Liu, L. Zhang, and J. Yanjey Chu, 2014, “Dormitory Management and Boarding Students in China's Rural Primary School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6(3): 523-550.
- 26.Zhang, J., and Z. Zhao, 2013, “Measuring the Income-distance Tradeoff for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7160, <http://ftp.iza.org/dp7160.pdf>.
- 27.Zhao, D., and B. Parolin, 2012, “School Mapping Re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3(4): 713-726.
- 28.Zhao, Y., 1999,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281-286.

(作者单位: 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²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经济学系;

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 鲍曙光)